

04

柳陞祺藏学文集

【汉文卷·上】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马 丽 华

柳陞祺藏学文集

【汉文卷·上】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序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

目 录

上 册

藏族简史(摘文)	
——17 世纪西方势力入侵至西姆拉会议	(1)
西藏名义辨析	(88)
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	(109)
十八世纪初清政府平定西藏准噶尔之乱始末	(151)
1727—1728 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	(171)
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意希生平事迹述评	(191)
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	(225)
关于古格反耶稣会斗争的材料	(249)
关于东印度公司派波格尔入藏之行	(255)
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	(257)
马齐——第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	(271)
所谓“西藏独立”及西藏的“宗主权”	(286)
1929 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	
——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	(292)
热振事件见闻记	(338)
回顾西藏和平解放时的几个涉外关系问题	(362)
评西方若干藏学研究者的藏族史观	(367)

评范普拉赫先生的西藏史观及其它	(394)
用历史的眼光认识西藏	(407)
一次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	
——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	(414)
应当争取有一个更大的藏学研究队伍	(422)

下 册

西藏政治	(425)
西藏地理	(477)
西藏宗教(上)	(526)
西藏宗教(下)	(573)
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	(651)
西藏喇嘛教与国外关系概述(初稿)	(689)
浅释“商上”	(716)
读《被隐藏的中印边界史》书后	(723)
《现代西藏的诞生》读后	(730)
《雪域求法记》(《康藏密教访求纪行》)读后	(739)
读《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	(742)
对李绍明同志一文的意见	
——老沙皇侵略我国西藏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	(746)
关于西藏交通史的参考书目	(749)
我进藏的第一课	(752)
关于在蒙藏委员会拉萨办事处期间的回忆	(761)
当年在拉萨的几个外国人(访问纪要)	(775)
向昨天告别	
——记1949年我离开西藏的经过	(778)
我的学习研究历程	(788)
我学习藏族史的经过	(794)
忆九世班禅	(796)

目 录

关于兰姆博士	(800)
为悼念李铁铮教授而写	(802)
寄给于老的一篇短文	(805)
写给邓锐龄先生的信函(1981 年—2003 年)	(807)
附录:	
邓锐龄先生回函(1988 年—2002 年)	(861)
编后	(907)

藏族简史（摘文）*

——17 世纪西方势力入侵至西姆拉会议

西方势力入侵的开始

西方势力进入我国藏族地区，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 20 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向亚洲扩张，欧洲的商船和传教士远涉重洋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时候，就有一些天主教士通过亚洲腹地来探索一条到达我国的捷径。其中，以印度的果阿（Goa）为根据地的耶稣会教士，就曾几次偷越我国沿喜马拉雅山的边界，企图到我西藏地方建立据点。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西南边疆的开始。

其时正当我国明末清初，噶举派（白教）各个地方势力连年内讧，日益式微，而新兴的格鲁派（黄教）寺庙集团正在逐步取代噶举派寺院的优势，从前后藏到阿里都处于一片分散和不稳定的局势。这一切为这些欧洲教士提供了可乘之机。

绵亘在我国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区，自古以来是藏族分布的边缘地区，同卫、藏、阿里有着极其广泛深厚的关系。这里从西到

* 《藏族简史》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所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1985 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印行。本文摘自柳陞祺执笔的该书第十二至十六篇章。

东，如拉达克、锡金（哲孟雄，འབྲས་མོ་ལྷངས）和不丹（布鲁克巴，འབྲུག་ཡུལ）的主要居民，根据他们的记载，就是从我国青藏高原迁去的藏人。他们同我国藏族同文同种，有长期的共同历史，有的可以上溯到公元9世纪后期吐蕃王室崩溃的时期。他们与当地族部的其他居民组成的政权组织和宗教组织，也都同我国西藏有极深的渊源，并对西藏保持有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被清政府列为所谓外藩。从不丹往东的门隅、珞瑜、察隅则是西藏地方行政单位或寺院的不同辖区。

此外，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的尼泊尔（巴勒布，བཤམ་བོ），也早从吐蕃王朝时期就同我国藏族开始了极其亲密的交往，为千余年来中、尼两国人民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上，我国西藏人民自来同喜马拉雅山外的地区往来密切。17世纪时，阿里牧区习惯用当地产的硼砂、湖盐、羊毛等土产，西向拉达克、南向库马翁（Kumaon，别译作：姑马乌）交换布匹、干果和日用品。阿里山羊的细绒毛运往克什米尔后织制高贵的毛织品，远近驰名，久被克什米尔上层视为一种特殊的利源。在后藏，同尼泊尔接境的聂拉木和吉隆两地，更是历史上西藏通往喜马拉雅山外的交通孔道。西藏历来从这一路输出羊毛、湖盐、牲畜以换取粮食、铁器和布匹等物。尼泊尔人常住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经商，人数众多，他们是我国西藏地方的主要外侨，也是西藏对喜马拉雅山外进行贸易的重要中介人。锡金、不丹的人民也有用米、谷、土产到帕里交换他们必需的盐、茶的悠久传统。此外，西藏还经由门隅、察隅同印度阿萨姆北境的居民进行定期交换，其中门隅一线的交易量，尤为可观。^① 珞瑜南境的珞巴族则不仅经常到阿萨姆边境市集进行交易，并且按照悠久的传统，对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岸（雅鲁藏布江下游）的

① 艾尔温：《十九世纪印度的东北边境》（Elwin, V. *India's North-East Frontier in the 19th Century*），1959, p. 10.

部分村落，拥有征收实物的权利。^①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国长期以来对西藏地方和喜马拉雅干线以外山岳地带的交往，从未加以限制。每年按照一定季节，喜马拉雅山南北的商旅自由往来，双方牧民选择冬夏放牧的草场时，可任意流动迁徙，宗教徒朝圣拜山的活动，也畅通无阻。这样又为以印度为根据地的欧洲天主教士提供了私越国境的有利条件。

最早的一批以葡萄牙籍神甫德·安瑞特（Antonio de Andrade）为首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就在1624年（明天启四年）化装成商人从喜马拉雅山西段的库马翁混入我西藏的阿里。这批教士到达象泉河谷的乍布朗（ཅ་བླང་，今札达县境）后，他们利用阿里的古格（གུ་གེ）土王同当地寺庙上层喇嘛争夺属民的矛盾，用厚礼贿赂、拉拢土王夫妇，来制造分裂。不久，他们就在土王夫妇的纵容和资助下，于1626年（天启六年）在乍布朗拆毁民房，改修道路，建立起西藏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后又从印度引入更多传教士来到北面的日土宗另开辟了一个新据点。这些活动引起乍布朗人民的反对，尤其遭到当地喇嘛寺院的抵制。但是这些外国教士又进一步蛊惑土王夫妇，想诱使他们改信天主教，并秘密策划，要土王强迫所有喇嘛还俗，以消灭寺院势力。这就激起当地僧俗大众一致起来反抗他们，并在具有藏族血统、信奉佛教的拉达克帮助下，结束了这个土王的统治，终于在1635年（明崇祯八年）把这些欧洲天主教士从阿里驱逐出境。^②

在这批教士到阿里进行活动的同时，另有两名葡萄牙籍的耶稣会教士凯塞拉（Steppen Cacella）和凯勃热尔（John Cabral），于1627至1628年间（明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亦从印度的果阿出发，经不丹潜入日喀则。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同在阿里的天主

① 麦根席：《孟加拉的东北边境》（Mackenzie, A.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1844, Chapter, III, p. 21. 兰姆：《麦克马洪线》（Lamb, A. *The McMahon Line*），1966, vol. 2, p. 310.

② 德·费利比编：《德悉德利西藏纪事》（De Fillipi, Filippo ed., *An Account of Tibet*），1923.

教士取得联系，要在后藏中心建立一个根据地。但是这些耶稣会教士的行径，早已引起后藏人民的警惕，他们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凯塞拉于1630年（崇祯三年）病死在日喀则，凯勃热尔也在两年后被迫离境。^①

这两批教士的活动，虽以失败告终，然而耶稣会教士企图探索一条从欧洲到达我国内陆路线的野心却迄未终止。到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终于有格儒佩（John Grueber）和道维尔（Albert D'orville）这两名耶稣会教士从北京出发，经由西宁青海湖地区进入西藏，到达拉萨，而后他们又从后藏的聂拉木出境，经尼泊尔、印度回到欧洲。他们这次行程引起西方国家广泛的重视，被称为横越我国内陆到达印度的第一批欧洲人。奥地利国皇帝利奥波尔特一世（Leopold I）为此写信给耶稣会总监，表示为了打击荷兰航船的海上霸权，他愿意每年指拨专款，作为继续探索这条内陆路径的经费，以示竞争。^② 到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又有一名叫德悉德利（Hippolyte Desideri）的耶稣会教士从拉达克潜入西藏。他在拉萨、山南先后住了五年余之久，而且进入小昭寺、色拉寺学佛经，精通佛教教义，写了不少著作，到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才从后藏出境。^③

耶稣会教士对我国西藏这样频繁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到这东方的藏传佛教圣地来从内部攻破这个堡垒，为西方的基督文明开疆拓土。所以，他们的活动还引起了天主教内部不同派系的竞争。另一个以印度为基地的天主教派系，喀普津（Capuchin）教会，在优先获得罗马教廷批准之后，也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始，陆续派遣以德拉·贝纳（Francisco Orazio della penna）为首的几批传教士，经由尼泊尔进藏，到达拉萨。当时正是前、后藏地方发生两个第六辈达赖喇嘛之争，引起蒙古准噶

① 瓦塞尔：《早期耶稣会教士在中亚细亚的旅行》（Wessels, C. *Early Jesuit Travel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The Hague, 1924, Chapters II, III.

② Wessels 书，p. 201.

③ Desideri 书，前言。

尔部的干预，使整个西藏陷于极度混乱的时期。因此这些传教士就能利用机会，混迹拉萨。他们还带来罗马教皇的信物，以笼络上层，一面传教，在拉萨断断续续活动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直到清政府派大军平定准噶尔，安定地方之后，才在1745年（清乾隆十年）将这些传教士遣送出境，结束了欧洲传教士从印度窥伺我国西藏门户的尝试。

然而这些欧洲传教士的足迹所至，终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到来的先兆。18世纪中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战胜荷兰和法国的竞争之后，初步奠定对印度孟加拉平原的控制，从而进入取代莫卧儿王朝对全印度的统治地位的开始。这个最初从一批冒险家和投机商发迹起来的私人商业公司，不仅成为英国对印度次大陆殖民的大本营，而且独占了当时中英贸易的大权，因而也是向我国进行扩张的先锋。但因为乾隆时候我国正对沿海厉行闭关政策，堵绝了外国势力从海路入侵的可能，于是，如何越过喜马拉雅山从我西藏地方来打开一条直达我国腹地的通道，就成了他们长期策划的一个侵略步骤。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同孟加拉北境的库赤·白哈尔（Cooch Behar）土邦的争执，以保护库赤·白哈尔为名，击败不丹，并侵入不丹国境。当时的第六辈班禅喇嘛贝丹意希，应不丹之请送信给东印度公司的督办华伦·海斯汀司（Warren Hastings），申明不丹同我国西藏保有的特殊关系，东印度公司的干涉应加制止，并愿为双方调解。^①东印度公司抓住这个机会先同不丹议和，以资拉拢，一面派遣一名亲信乔治·波格尔（G. Bogle）率同医官一行，以“通商”为名，经不丹介绍，进入日喀则。这就是英国势力进入我国西藏地方的第一次活动。

波格尔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进入后藏，停留半年余

^① 马克罕编：《波格尔入藏纪行》（Markham, C. P.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1876, Introduction pp. LXVII-LXVIII.

之久。在这期间内，他一面企图通过班禅喇嘛的宗教地位和影响，要求清政府对英国开放贸易，一面竭力奉承班禅喇嘛，想诱使他同东印度公司私立某种直接的关系，来离间达赖、班禅这黄教两大系统，以达到最后破坏我国统一的诡谋。然而使他失望的是，无论拉萨还是扎什伦布都十分明了东印度公司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先施小惠以笼络，然后把势力伸入，制造纠纷，终于做了那里主宰的一套侵略伎俩。^① 班禅对波格尔的几次谈话以及后来写给东印度公司的复信中，明确指出，整个西藏是在中国大皇帝主权管辖之下的地方，西藏的一切无不听命于北京的朝廷。^② 波格尔在给他上司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一路遇到阻碍他前进的一块拦路石。

波格尔入藏的另一个意图，是乘我邻国尼泊尔的廓尔喀族王朝崛起，正与锡金争地，而锡金又对我西藏有隶属关系，因而进行挑拨，以离间中尼两国，从中渔利。但是班禅答复他，我西藏政府已派兵前往保护锡金，争端不久可望平息，不需要外力帮助。最后，波格尔希望班禅去北京为清高宗祝寿时，代向清政府转达对东印度公司开放贸易的请求。这一点也终成泡影，迄未如愿。

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这名职员也终于同班禅系统拉上了关系，为此东印度公司还同意扎什伦布寺在加尔各答的近郊建立一处庙宇，以资笼络。此后，到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又以祝贺第七辈班禅喇嘛坐床的名义，派出一名武官忒纳（S. Turner）到日喀则活动，但同样以失败告终。忒纳初次测绘了他所经过的入藏路线，有助于英人后来的侵略。此外，他向东印度公司提出了一条重要建议，他认为要同中国建立关系的一个坚实基础，就是先同西藏建立关系，因为唯有通过西藏，才能到

^① Markham, pp. 131-132.

^② 兰姆：《不列颠和中亚细亚、通往拉萨的道路》（Lamb, A. *Britain and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1905*），London, 1960, p. 15.

达北京。^①又二十余年后，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另一名东印度公司职员汤姆斯·马齐（T. Manning）自告奋勇，潜入西藏，并到了拉萨。但是因为他一无所获，回去后被上司斥为狂人，最后郁郁而终。

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情况开始起了巨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压迫的斗争不断上升，清政府的实力日见衰落，沿海门户已随之洞开。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迅速扩张的结果，使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带都暴露在它的面前，成为供它蚕食鲸吞、恣意掠夺的目标。从此，英国势力在这一地带每前进一步，也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矛头对我西藏更逼近了一步。

东印度公司对沿喜马拉雅山侵略的第一个目标是尼泊尔。尼泊尔是历史上我国西藏通往印度的孔道。它从18世纪末开始对清政府保有纳贡的关系。19世纪初，廓尔喀王室的兵力所及，东至锡金，西抵库马翁，南及喜马拉雅山麓毗连印度平原的大片低洼地区，所以它不仅是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北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而且还威胁到英国向印度西北扩张时的侧翼。为了抵御东印度公司势力的膨胀，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除了联络当时印度的地方割据势力之外，又在国内提高过境商税，沉重打击了英国商品的运销。这一切终于促使英国于1814年（嘉庆十九年），借边境纠纷为名，向尼泊尔发动了战争。

尼泊尔在奋勇抵抗的同时，曾一再向拉萨的驻藏大臣求援。它指出英国侵略的目的，不仅在尼泊尔一隅，而是要打通我西藏南方的门户，以开辟一条侵略中国的道路。^②然而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对这些具有远见的警告，竟一概严加驳斥，并拒绝给予任何形式的援助。结果尼泊尔在几次英勇击退入侵者之后，终以国力有限，于1816年被迫签和，割让了西部库马翁等大片土地。从

① 忒纳：《西藏扎什伦布寺访问记》（Turner, S. *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London, 1806, p. 373.

② 《廓尔喀奏议》（手抄本），廓尔喀案上，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一年部分。

此英国势力第一次同我国的西藏直接为邻，亦是尼泊尔逐渐转入英国势力控制的开始。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侵略尼泊尔的同时，又准备了掠夺锡金的下一个部署。在尼泊尔这次割让出来的土地中，有一片接邻尼泊尔东部平原的低洼地区，是它在 1788 年（乾隆五十三年）侵占的锡金地方。当时的锡金王被迫避居锡金东部，处境日蹙。我西藏地方曾将卓木山谷以南热纳宗（རི་ནང）的赋税，拨给锡金王管理，以资维持，但对锡金同尼泊尔有关辖地的争执，却未加追究。^① 这一切为英国侵略者留下一个可乘之隙。东印度公司趁这次战胜之威，逼迫尼泊尔承认了如果当地遇有纠纷，应由英国人充当尼泊尔与锡金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然后他们又以归还原属锡金的这片低洼地区为钓饵，诱使锡金王室接受一个秘密条款，即凡遇锡金同尼泊尔发生争执时，必须接受英国仲裁的规定。不久，东印度公司便唆使锡、尼边境的部分居民对锡金王发动叛乱，再由公司出面调解，借此勒索，于 1835 年（清道光十五年）强租到锡金南部的一片山区以供英人“避暑”。这就是现在印度的大吉岭。大吉岭山区在英人积极经营下，不久又成为他们对我西藏地方长期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

19 世纪 20 年代，当英国殖民势力从孟加拉向东扩张到阿萨姆平原时，它又采取不同手腕开始了对不丹和我国珞瑜南部的蚕食。最先东印度公司向不丹承揽了不丹南境与孟加拉、阿萨姆接壤的大片山隘地带的经营权，而后漫无止境地扩大权限和经营地面来逐步加以掠夺。同时，东印度公司又对沿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部分村民向珞瑜部落头人缴付实物的传统进行了干预，再用武力逐步向北推进。此外，他们对接连我门隅、察隅南端的阿萨姆平原，更是积极经营，想通过这两路把势力一直伸入到我西藏东境和四川、云南的边缘。

^①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八，第 340 页。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升泰，卷一，第 2 页。

到19世纪40年代，东印度公司势力又扩展到印度西北，扶助山区一个小邦的道格拉（Dogra）王室取得对克什米尔的统治，并置之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于是英国的侵略矛头又随之伸入到拉达克和喜马拉雅山的西段。

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向我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我国西南沿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边境，从西藏东南部的察隅到西北部的班公湖西端，都与被英国势力侵占或受它不同程度控制的地方直接为邻，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原来对我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地区和邻邦已一一转入英国的势力范围。一度被视为我国后院的西藏，现在一变而为我国西南国防的又一个前沿阵地。每逢在我国家广袤的国土上一方有事，西藏地方亦必同时告警，这已成为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明显的规律了。

自从鸦片战争首次冲破我国沿海的门户，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衰弱后，资本主义列强蜂拥而至，使我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大英帝国既拥有威慑我东部海岸的海上霸权，同时又具备从印度窥探我西南门户的地利条件，因而成了对我国特别严重的威胁。从此开始的百余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疯狂掠夺的过程，也就是我中华各族人民对此展开前仆后继、英勇卫国的反侵略斗争的过程。藏族人民抗御外侮、保卫边疆的业绩，就是这一伟大斗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1840年（道光二十年）始，我东南沿海遭受英国炮舰摧残的同时，在我极西的西藏阿里地区，即受到一次来自克什米尔的武力侵袭。在东西两隅抵抗外来侵略之中，我国优秀的藏族子弟都作出了光荣的贡献。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遣炮舰因为进攻广州受挫，改道北上，窜扰浙江海岸时，就有一支由四川大金川和瓦寺（ཁ་ཤི）派遣的两千余人的藏族队伍，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驰抵浙东，支援海防。金川的团练和瓦寺宣慰使所辖的士兵都曾在乾隆年间击败廓尔喀的战争中立有战功，他们这次参加的是计划乘

敌不备，袭取被占领的宁波、镇海两城的宁镇战役。大金川的八角碉土司阿木禳和瓦寺土守备喀克哩的部分部属被编入四川营参将王国英率领的队伍，负责攻取宁波南路。不幸因有内奸先把消息泄露，不得已提前攻城，结果在冲锋冲入城内，但未及占领全城时，即在敌人伏兵的炮火下，作了壮烈牺牲。^①

宁波失利后，另一部藏族队伍在副将朱贵指挥下协同陕甘军和四川军，并肩作战。参与了宁波附近的大宝山战役，瓦寺土舍索诺木文茂带领士兵，在同英军的一次遭遇战中，他们利用地形，奋勇杀敌。据记载，当时敌人虽有锋利的枪炮，但因困于湖沼，一次即被我士兵斩获百余人。^②

宁镇战役和大宝山战役是这次浙东的两次重要战役。尤其防御大宝山一役，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据记载英人自己承认“自入中国来，此创最深”，^③使他们于一个月后作出撤出宁波的决定。正如文献记载所说，这些藏族士兵，作战异常英勇，每次行军必争先锋，耻于落后。然而他们都长于野战，而不习巷战，要他们进城作战是舍其所长，用其所短，所以没有更好发挥出他们的战斗力。后来当地人民还是把阿木禳、喀克哩两人附在朱贵将军庙内，加以祭祀，以表达对他们的哀悼和敬意，^④这就足以说明群众对他们评价之高。

在这部分金川、瓦寺的子弟为捍卫祖国东南的海疆而贡献出他们生命的同时，另一支由前、后藏子弟组成的部队又奔赴阿里，去抵抗一股从拉达克窜入的道格拉（即森巴）侵略军。

“森巴”（མེང་པ་）是西藏对印度锡克族的属部之一道格拉族统治者的藏称。道格拉族的土王于1820年受锡克封赐查漠为

① 《鄞县志》，十六，大事记下。第26页。《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1954年出版，第666—667页。夏燮《海疆殉难记》，中西纪事卷二十四。

② 《汶川县志》，民国三十三年版，卷六，第159页。祝世德《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民国三十四年版，第十一页。

③ 《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428页，辛壬识略。

④ 《鸦片战争资料》，《慈谿县志》，第421页，经政志卷十四，朱绪曾《武显朱将军庙碑记》。

根据藏文《拉达克王统记》的记载，道格拉军进军之前，曾考虑把我国新疆的叶尔羌和西藏的阿里，同时作为他们的军事目标以双管齐下的计划。^① 原因是清政府厉行禁烟，不久前在叶尔羌焚毁价值八十万卢比的鸦片，而鸦片正是克什米尔通过拉达克运销叶尔羌的重要商品之一，^② 可以作为他们进军的口实。然而他们考虑到叶尔羌道路遥远，中间隔着极度荒凉的无人地带，危险性大，而阿里则距离较近，虽亦地旷人稀，但他们知道除防军五百名外，别无军备，于是选中阿里。他们利用拉达克与阿里民间的传统关系，扬言将入藏朝拜雪山，于是偷偷动员了三千余军队之外，还裹胁大批拉达克人和巴尔底斯坦人，分三路入侵。左路沿班公湖东进，先袭据日土宗，以防御我北路从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南下的援军。右路沿象泉河谷前进，又攻占乍布朗和托丁（མཐོ་ཁྱེང་，今札达县）。中路溯狮泉河而上，强占噶尔雅沙（གྲར་དབྱར་པ་，今噶尔县），深入无阻，一直推进到玛法木错湖附近，才遇到我西藏地方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然而在我藏军主力赶到之前，敌人已三路会师，深入普兰宗，军行所至，烧杀焚掠，许多村落寺院都被毁坏无遗。于是他们在几个重要据点，建筑堡垒，分兵驻守，不仅准备长期占领，并且公然扬言要向前、后藏继续进军，作进一步的侵略了。

② 达塔：《拉达克和西段喜马拉雅山的政治》（Datta, C. L. *Ladakh and Western Himalayan Politics: 1819-1848*），1973，p. 128, 181-182，引用 A. Cunningham 1841 年调查报告及有关档案。